

語言作為共同體以外

——評文潔華編《粵語的政治——香港語言文化的異質與多元》

● 黎國威



香港教育局在其「語文學習支援」網頁中，註解粵語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為甚麼一條小小的註解能觸發軒然大波？為甚麼教育局需要息事寧人？文潔華認為這證明談香港人身份及其認同的研究，並非偽命題。

文潔華編：《粵語的政治——香港語言文化的異質與多元》（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

一 「粵語」作為討論場域

從前，香港的資本、文化往北輸出，深深影響着中國大陸；今日，香港經濟日益依賴中國大陸，

文化產物無論質或量都大不如前。港產片年產量逐年下跌、電視劇橋段重複常為人詬病、流行歌星新人承接乏力……莫不昭示香港文化漸入黃昏之景。際此危機，香港近年反而掀起關注本土文化的浪潮。文潔華在《粵語的政治——香港語言文化的異質與多元》（以下簡稱《粵語的政治》，引用只註頁碼）的〈前言〉提及的語言事件，即香港教育局在其「語文學習支援」網頁中，註解粵語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她認為這證明談香港人身份及其認同的研究並非偽命題（頁 xvii）。

若循語言講身份認同，不能不提政治學者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的經典著作《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①。安德森爬梳歷史文獻，提出陌生人之所以能構成共同體，在於他們藉着閱讀並使用相同的語言文字，憑想像認為大家有着某些共通點遂連結彼

此，乃至成為一個民族。這套以語言為民族主義發端的論說，在香港不乏市場。例如在《香港民族論》一書中，幾位論者皆引用其觀點，嘗試論證具獨特語言、文化生態的「香港人」堪稱為「民族」②。

上述語言事件，或可稱為以語言想像共同體的表現：人們感覺自己的認同想像根源被侵犯，群起反應，在網上更有人號召一人一信要求教育局澄清，最終迫使教育局刪除有關內容，並就用語不精準向市民致歉③。無論是市民大眾的看法，還是學者如文潔華的解讀，都顯示這是一件值得關注的文化政治事件。但退一步想，為甚麼一條小小的註解能觸發軒然大波？為甚麼教育局需要息事寧人？為甚麼這件事足以證明討論香港人身份及身份認同並非偽命題？這是否側面反映了香港當下的文化政治生態？

自2011年《香港城邦論》出版後，該書作者陳雲儼然成為香港本土派的旗手。他定位香港為一城邦，指出近年香港已進入族群政治的前沿：「解決族群政治，促使族群良性融和而不是催化惡性排斥，只有重提香港的城邦精神。這是香港本土意識的唯一出路，也是族群政治的唯一解決方法。」④觀乎他一直以來針對大陸人和香港新移民的言論，似乎跟上述觀點矛盾，但只要理解何為「城邦」，便可清楚矛盾的由來以及這套論述如何疏解相關問題。

陳雲聲言其「城邦」構想源自於古希臘的城邦體制。據柏拉圖在《理想國》(*The Republic*)的描述，

希臘人認為不說希臘話的都是野蠻人(*barbarian*)⑤。換句話說，講希臘話就是文明人的證明。縱然陳雲的《香港城邦論》只是從歷史向度類比香港與希臘城邦政治氣候的相似性，未有言明城邦及其市民跟語言的關係，惟無論是從他的網上言論，以至於其「中文保育系列」叢書中有關中國語文的討論⑥，莫不將粵語推許為比普通話更優秀的語言。甚至，他的「城邦論」續作《香港城邦論II》，更以整整一章論述傳統中文與文化產業的關係，視保育香港人日常應用的語言為復興香港文化/華夏的關鍵⑦。是故，稱其族群政治的根本在於以人們使用的語言來明定文化層級之高下，一點也不為過。按這種說法，外來人要融入香港，就要學好地道粵語；不然，就是為城邦加添雜質，影響了城邦/香港人的純正性，亦即是陳雲口中的「華夏」。姑勿論陳雲到底有多大影響力，這種論述的產生至少證明當下的香港急欲尋求身份認同的根據——流行文化偏偏處於弱勢，無法承載人們重建本土身份的渴求，部分人目光遂轉向於日常生活應用的語言：粵語。

近年，香港學術界亦開始關注香港人的認同轉向，例如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於2013年2月主辦「香港廣東文化的未來」學術研討會，《粵語的政治》一書的部分作者亦曾與會發言及參與討論。《粵語的政治》一共收錄十四篇論文，分為「粵語再現：流變的文本」、「粵語大眾：本土、移民與少數族裔」、「粵語聲張：語言、身份與文化政治」三部分。縱觀這部論文集的文

《粵語的政治》從粵語逐漸被邊緣化的危機出發思考香港以至粵語文化的未來，把「粵語」視為一塊討論場域，講「粵語」並不局限於回應當下躁動的「香港人」身份認同政治，而是把「粵語」放進更寬廣的文化脈絡裏討論。

余少華認為，以粵語演唱的流行曲，其實是一套以本土為包裝的大敘事。「粵語流行曲」以現代音樂的姿態把不符合現代音樂美學觀念的音樂品類排擠至邊緣位置。

章，其取向跟陳雲以及《香港民族論》諸作者不同：如果說前者是從粵語逐漸被邊緣化的危機出發思考香港以至粵語文化的未來，那麼後兩者則傾向於藉着論述粵語建構某種民族身份；前者關心的是於當下熱烈討論粵語文化的氛圍裏，提出更多尚待留意的討論面向及議題；後者反映近年有很多關於粵語的「意見」(Doxa) ⑩——意在論證香港日常語言與普通話的差異，甚至有盲目吹捧粵語為漢語裏地位較高的語言，從文化優越的角度生產一套「語言民族主義」。

問題是，語言除了作為建構共同體的中介以外，還牽涉了甚麼問題？《粵語的政治》把「粵語」視為一塊討論場域，講「粵語」並不局限於回應當下躁動的「香港人」身份認同政治，而是把「粵語」放進更寬廣的文化脈絡裏討論。下文將嘗試從該書中勾勒幾個值得思考的範疇，展現「粵語」的多元與複合。

二 音樂/聲音與邊緣者的文化政治

文化研究學者阿巴斯(Ackbar Abbas)曾為香港文化把脈，批評香港人長期對自身既有文化視而不見、認為香港是「文化沙漠」，並以「逆向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命名這種病態；然而，1997年後香港人卻因急欲定義文化身份，熱衷於尋找足以命名「香港」的集體回憶和懷舊風物，這種由不見文化到發現文化的文化現象，他稱之為「消失的政治」(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⑪。

音樂研究學者余少華在〈「師娘腔」南音承傳人與港澳文化〉一文中觀察到，近年一些香港導演(如關錦鵬、許鞍華、王家衛)均在電影中採用「南音」(以廣東話表演的說唱音樂)這種音樂去襯托鏡頭下消逝了的舊日香港畫面，但偏偏很多觀眾及學者卻聽不到或認不出，甚至錯認或誤認為別的東西，放棄或漠視了自身文化的歷史(頁24)。這其實也無可厚非，先不說香港回歸前殖民地政府為方便管治，不太着重歷史教育——尤其是香港本土歷史的教育，於課程編排上堪稱「鳳毛麟角」；更不用說中學的音樂課，通常只是教授西方音樂知識，讓學生聽聽英文歌，學生鮮少機會接觸中樂——並非每所中學都有資源成立中樂團，更遑論介紹「南音」？余少華追溯歷史，提出香港的「聲音境域」/「音境」(soundscape)之所以容不下「南音」，在於1970年香港電台終止每日廣播杜煥誓師的演唱，使「南音」失去了重要的傳播媒介(頁23)。換句話說，香港人對「南音」的失憶，以至錯認或誤認，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們愈來愈少機會接觸到原本日常生活慣常聽見的音樂。這產生了粵語文化被西方品味取代的現象，即「流行」等同於以西樂為主體的「粵語流行曲」，傳統音樂品類遂被視為「不夠國際與現代」或「跟不上潮流」(頁31)。

「音境」轉移不只是大眾文化消費選擇的問題，更是美學現代性的問題：以粵語演唱的流行曲，其實是一套以本土為包裝的大敘事。「粵語流行曲」以現代音樂的姿態把

不符合現代音樂美學觀念的音樂品類排擠至邊緣位置，而大眾傳播媒體的篩選機制，即挑選播放甚麼類型的音樂，更是這種美學現代性的共謀。當判定音樂流行或不流行的標準乃是要經過一套預設的美學觀生產時，其問題便在於壓抑了多元的可能。為此，余少華認為必須好好研究「南音」及其「師娘腔」承傳人吳咏梅。他把吳咏梅視為大歷史下的小敘事，於「南音」已被邊緣化的今天，藉着介紹及研究她，重提一段被壓抑的“her-story”（頁33-37）。這其實是操演邊緣者的文化政治，以揭破所謂「粵語流行曲」等同「香港音樂」的神話。

許冠傑於香港樂壇向有「歌神」之稱，但其地位並非完全建立於唱功或曲藝之上，而是他的音樂與香港粵語電影的再興有着密切關係，以及他擁有唱出小市民心聲的言說位置，開「粵語流行曲」一代之潮流。專研香港流行音樂的戚夏蕙在〈Cantopop的廣東話：小市民心聲〉一文以文本細讀方式，比較許冠傑和「80後」音樂組合My Little Airport (MLA) 的歌曲歌詞，反思許冠傑神話背後的意識形態。

據戚夏蕙的分析，許冠傑和MLA同樣有以打工仔、低下階層為題的歌曲，前者有《半斤八兩》、《加價熱潮》；後者有《邊一個發明了返工？》、《西西弗斯之歌》。這些歌曲都訴說了香港人工作與生活的苦況，但無能力改變現狀的無奈。雖然兩者看起來很相似，但戚夏蕙指許冠傑的歌曲描述的打工仔和小市民就算抱怨也只能怨天和認命，完全沒有反省問題的根源，

是當代順民的寫照（頁100）。至於MLA的歌曲則以零碎的片段，道出這一代人的集體回憶，令聽眾產生共鳴和勾起自己的個人小故事（頁111）。兩者的分別在於創作者/演唱者的言說位置。許冠傑開始唱出小市民心聲時，早已是成功的歌手和電視電影明星，不再是升斗市民；MLA雖然在小眾市場甚有知名度，但不見容於主流樂壇，不算是當紅音樂組合。他們畢業初期更是一邊工作，一邊創作音樂，一直處於社會低下層。

戚夏蕙筆下的這種存在狀況可以引申以下兩點解讀：首先，演唱者的社會地位跟其歌曲題材是否存在落差；其次，歌曲風格一成不變還是隨着其成長而轉變為更貼近時代脈搏。許冠傑既已是當紅明星，歌曲裏的小市民心聲自然是一種扮演；相反，MLA卻是把他們的生活感受以第一身的角度唱出來。同樣地，許冠傑已脫離了市井小民的生活，他只能一成不變地生產「小市民」的聲音；MLA的歌曲則隨着他們的社會閱歷，「從純情感性的文藝青年走向性感欲望青年」（頁103），他們的創作題材也從身邊的人和事擴展至社會時事。當許冠傑只能採取扮演姿態，他的市井歌曲也不過是由上而下對低下階層的「大敘事」，即「大時代人所共知的故事，也是維持現有固定政治、社會、經濟狀況的故事」（頁110-11）。這套敘事切合1970、80年代的香港社會：經濟剛剛起飛，人們只要肯努力就能捱出頭。相對而言，一直生活在低下階層的MLA，演唱的根本就是自己的心聲，是一些由

MLA的小故事與許冠傑的大敘事，跟香港的社會經濟發展有着隱密的關聯。許冠傑被奉為「歌神」，其背後的深層結構為社會意識神話化，適合於言說當時社會的成功故事。

跨國資本讓粵語電影走向全球，使粵語電影深刻地依附於各地市場的經濟或政治環境變動。循粵語電影理解粵語文化時，便不得不引入跨國視野。從全球化的脈絡而言，粵語文化只是眾多文化的一種，於各種文化的競逐中不見得具有任何優勢。

下而上言說的「小故事」。他們身處的正是新自由主義承諾無法兌現的年代：勞動階層無法共享經濟成果，物價與人工的升幅差距愈來愈大，年青人再努力也看不到未來。MLA的小故事與許冠傑的大敘事，跟香港的社會經濟發展有着隱密的關聯。筆者認為循此視角，許冠傑被奉為「歌神」，其背後的深層結構為社會意識神話化，適合於言說當時社會的成功故事，這使得MLA的創作成為一種邊緣者的文化政治，有着顛覆神話的意味。

三 從跨國視野看「粵語」

「粵語」作為一種語言本身，於漢語語言系統裏長久以來處於邊緣位置，備受國語/官話的壓制。歷史學者鍾寶賢在〈國語運動與大戰前後的香港粵語電影業〉一文中指出，早在清朝中葉，統治者已推行「國語運動」。清廷為消除南北語言隔閡和官員間的溝通障礙，於1728年成立正音書院，規定南方官員須學習官話（頁187）。清朝的國語運動僅實施於統治階層，即由貴族及士大夫組成的小圈子權力集團，平民百姓的殊異口音非其關注所在。傳統帝制終結以後，民國政府依據西方現代範式建立民族國家，國語便不只是作為方便管治階層溝通的工具，而是懷着趨向現代的欲望。因着「民族」之名，國語運動有必要滲透至平民百姓，流行文化（如電影）成為推動國語的重要場域，是以民國政府設立中央電影檢查制度。在大一統語言作為民

族國家的建國方略指導下，與「國語」相對的都是「方言」，都是必須壓抑以至排除的對象。

民國初期，粵語電影於沿海城市、兩廣和東南亞大受歡迎，國民政府遂把矛頭對準粵語片商，甚至打算全面禁制粵語電影。只是抗日戰爭爆發，國民政府無暇兼顧，粵語電影才暫時得脫禁制。片商為尋出路，便把片廠及資本遷至香港，使香港成為華南粵語電影製作的避難之所。抗日戰爭結束，緊接着爆發國共內戰，使大量人才與資金南移到香港。如蔣伯英的大中華影業公司、李祖永的永華影業公司等相繼在香港成立，香港遂發展成另一個國語電影製作的基地（頁195-200）。鍾寶賢認為，粵語電影與國語電影在香港爭雄，並不只是文化或語言的比拼，還是各地資本追逐市場的資本主義發展格局的表現。粵語電影於1960年代獲星馬資金支持，得以蓬勃發展。為配合市場/受眾口味，粵語電影亦一改「清潔運動」^⑩以來以寫實為宗旨、反映民間疾苦的主題，慢慢增添了具都市特色的言情題材（頁209）。這顯示了跨國資本的介入，使粵語電影得以走進全球格局，藉着跨越國家邊界找到了延續以至壯大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粵語電影無可避免地背棄了原先一些電影人期許的文化功能，服務於市場口味與邏輯。

然而，市場並不是單純為追逐資本的遊戲。鍾寶賢提到粵語電影於1960年代後期衰落的原因，在於東南亞地區的「華語運動」、排華風潮盛行，政治環境左右了資本市場發展，令粵語電影無法依賴「賣

片花」維持產銷循環，而國語電影又乘時而興，成為當時香港的主流電影（頁209）。由此可見，粵語電影的發展跟當時東亞、東南亞地區的文化政治環境互動。跨國資本讓粵語電影走向全球，同時使粵語電影深刻地依附於各地市場的經濟或政治環境變動。換句話說，粵語電影作為粵語文化的載體，循粵語電影理解粵語文化時，便不得不引入跨國視野。從全球化的脈絡而言，粵語文化只是眾多文化的一種，於各種文化的競逐中不見得具有任何優勢。

粵語作為一種語言，置於世界文化版圖裏不具重要角色，甚至處於邊緣位置，尤其可見諸本地學術界。傳播學者馬傑偉親身經歷本地大學愈來愈講究計量管理的轉變，以接合世界學術發展的潮流。他在〈本土教學與研究的語文政治〉一文中指出，大學管理漸趨精細，研究產量與學系財政掛鈎，用英語發表的論文由於能走進國際學術圈，故於績效考核時的評分往往比中文書寫更高、更獲重視，為學系爭取的資源也更多。相對而言，中文學術寫作必須花心思和時間「抗辯」，以證明學術價值不遜於英語研究成果（頁221-22）。這種學術生產模式多為學術界所詬病，認為迫使大學教師為求保住職位、學系為求爭取更多資源，將精力與時間集中於研究，嚴重影響大學的教學素質。此外，不只語言有分等級，研究範疇亦然。立足於香港本土的研究，往往比其他研究領域的地位為低，沒那麼受西方學界重視。若以英語發表學術成果還好一點，至少能「接

觸」國際學術界；用中文書寫的話，基本上無助研究者於學術巨塔內升遷甚至生存。

中文書寫及本土研究逐漸邊緣化，其一是由於全球化令學術交流不得不面向更廣大的（英語）受眾；其二是日漸盛行的管理主義講求計量方式以考核實績。研究者爭取於英語國際期刊發表論文，遂成為回應實效指標的有效手段。學術研究似乎已成為一套爭奪資源的權力遊戲，而這套遊戲的具體操作，便是從語言及研究範疇定位層級。

馬傑偉自稱學習其師、英國傳播學者科倫（James Curran）的理論架構，經反覆推敲後，嘗試應用於香港現實。留洋學習的經歷使他明白到，儘管英語學術界的實證與案例往往來自歐美社會，不無以偏概全之嫌，但它們確實於理論探索有着豐厚成果，故此，他無意簡單地把當下學術圈的狀況視之為英語學術霸權（頁216）。相反，他認為英語學術圈規範相對嚴謹成熟，借鑒國際英語學術體制，有利於提升本土研究的質量。他認為：「今天最重要的策略性進路在於，不抗拒英語學術的強勢，借用其資源，但同時不自卑自貶，努力在體制內外創造母語討論與華語學術書寫的條件與空間。」（頁223）這套策略令人想起羅永生以「臥底」隱喻香港人的認同結構^①。「臥底」身處邊緣位置，以雙重效忠的方式，游走於兩股以至多股勢力之間，左右逢源，走出自己的路。怎樣在應對體制要求的同時繼續自身的學術追求，似乎是馬傑偉這篇文章較為關心的面向，而不是單純批判目下體制存在的問

中文書寫及本土研究逐漸邊緣化，但馬傑偉無意簡單地把當下學術圈的狀況視之為英語學術霸權。他認為英語學術圈規範相對嚴謹成熟，借鑒國際英語學術體制，有利於提升本土研究的質量。

題。這種思維其實就是邊緣思維：在承認自身條件有限的前提下，嘗試在縫隙裏尋找生存空間。

四 從香港的內部「他者」看「粵語」

上述的文章主要討論粵語涉及的文化政治，有助我們打開思考相關議題的維度，但討論範圍未有直接對應「城邦論」、「民族論」等涉及的「語言民族主義」或「文化民族主義」。《粵語的政治》一書中有好幾篇文章談及的「他者」政治，正好能對應這些「主義」涉及的議題。《香港民族論》提倡的「文化民族主義」，看似跟「城邦論」以語言界定「香港人」身份有所差別，但須留意該書用以申明香港人身份認同根據的「文化」，其中一種具體表徵是香港的流行文化文本，即以粵語生成的流行曲、電視劇、港產片等¹⁰。換句話說，在香港近年出現的「語言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氛圍中，語言/粵語都是被用來理解香港作為一個文化體的重要指標。這種看法已進入不少香港人的認知結構，形成了香港浸會大學人文與創作系教授陳錦榮在〈不陌生的陌生人：香港少數族裔的陌生化〉一文批判的「霸權式『香港廣東性』的種族政治」（頁118）。

所謂霸權式「香港廣東性」，具體表現於人們掌握「香港廣東話」（Hong Kong Cantonese）的能力，視之為表明香港人身份或其歸屬感的證明（頁125）。很多香港人憑着口音的殊異，於香港內部尋找「他

者」。在這種情況下，無法言說或說不好「香港廣東話」，就是一群失語的「陌生人」。一般人只會留意跟他們同聲同氣、操同一套語言或口音的同伴，而漠視甚至無視那些跟他們口音不同的人。這構成了以語言在香港實行內部殖民的狀況。故此，陳錦榮認為需要質疑和解除這種持續建立的霸權文化情緒，以及自我建立的「中國性」。他用「中國性」而不是「香港性」指涉這種主體性，暗諷「城邦論」或「民族論」的內核，其實是「大中國主義」的變種與殘留。尤其是當「城邦論」指稱粵語是一套繼承了華夏的語言時，其背後的「中國」脈絡顯而易見。

要處理上述的霸權文化情緒，陳錦榮認為必須扭轉一些根深柢固的思想：香港雖然是個全球化城市，但弔詭地它相當「去種族化」（raceless），對於同一天空下生活的種族化陌生者認識甚少。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要拒絕歷史的健忘症：「雖然非特權少數民族佔總人口的5-6%左右，但是他們建立起明顯的社群、有着獨一無二且各式各樣的風俗習慣，並為香港社會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頁125）其次，要建立有關種族和種族主義的公共或家庭教育，不再無視種族不平等的狀況（頁216）。近年香港人從語言建立本土身份的論述，本來就是為了抗拒來自北方的霸權語言以國家機器的權力推動語言統一。陳錦榮的文章提醒香港人必須將種族視野納入本土身份的建立，以免被壓迫者在自我建構的過程中反過來變成壓迫者，重複壓迫者的邏輯，壓迫更弱勢的群體。我

近年香港人從語言建立本土身份的論述，本來就是為了抗拒來自北方的霸權語言以國家機器的權力推動語言統一。陳錦榮提醒香港人必須將種族視野納入本土身份的建立，以免被壓迫者在自我建構的過程中反過來變成壓迫者。

們在討論「城邦論」或「民族論」時，必須思考這些涉及「去殖」或「解殖」的深層問題。

「城邦論」或「民族論」處理語言作為認同紐帶時，不無忽略香港是一個多種族城市，僅僅把中港矛盾，即「中國人」和「香港人」的對比與對立納入思考框架。事實上，香港有數十萬來自東南亞的勞動人口，當中為數不少任職家庭傭工，由於工作關係學懂頗為流利的粵語。從語言作為認同的角度看，這些人是否也算是「香港人」？社會學者何偉業的追蹤研究，引導讀者重新思考如何理解「印傭」與「香港人」之間的關係。他在〈香港的印尼傭工與粵語文化〉一文中指出，少數族裔的日常生活難得為人注視，當她們進入大眾媒體視野時，報導主題往往是僱傭衝突。近年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2014年印傭Erwiana被僱主虐待的事件。然而，藉着訪問一些在港工作的印傭，何偉業發現香港僱主與印傭的關係未如一般媒體所報導般緊張。例如其中一對受訪者陳太和印傭Yanti，兩人情如母女，縱然前者退休後可自理家務，但仍留後者在香港工作。箇中緣由乃在於Yanti留港工作日久，慢慢學懂一口流利的粵語。懂得粵語，兩者便得以無隔閡溝通，情感由是滋長（頁160）。

何偉業指出，印傭學習粵語，原本是為求與菲傭競爭就業的勞動資本（頁157），為此甚至得背上更多以培訓為名的債務（頁159）。學習粵語對這些印傭而言，並不是因為戀慕「華夏文化」，或視懂得一口流利粵語為文化認同，而是出於

工作需要。何偉業指出，很多印傭被僱主安排照料家中長者，當她們日復日陪伴長者，一起看電視、聽長者說話，便慢慢學懂了粵語（頁158）。與此同時，在工作過程中，她們逐漸與服務對象培養出感情。可以說，粵語一方面是謀生工具，另一方面是分享情感的媒介。這種情感紐帶跟文化認同不一樣：以印傭來說，她們並不認同自身作為「香港」市民或共同體之一員，而是認同自身作為某「家庭」的成員。筆者認為，「城邦論」或「民族論」僅僅把粵語視為文化認同的表徵，未免化約了語言/粵語於建立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複雜面向，無法解釋像印傭這種跨國勞工學習以至運用粵語作為日常溝通語言，是一套怎樣的身份建構過程。簡單來說，就算操同一套語言，也不等於認同某種文化以至政治共同體；語言作為一種溝通工具，它可以連結着不同模式的情感結構。因此，語言作為構建共同體的媒介以外，還有更多的可能。

五 尚待言說的「『粵語』的政治」

《粵語的政治》一書的編者文潔華於〈前言〉劈頭第一句便強調這本書並非一本會議論文集（頁vii）。這句話既指本書的文章不少是約稿，更可理解為本書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論文集」。馬來西亞籍華裔學者陳允中的文章〈香港有標準廣東話嗎？〉恰恰說明了本書與別不同之處。他以粵語入文，沒有採用

「城邦論」或「民族論」僅僅把粵語視為文化認同的表徵，未免化約了語言/粵語於建立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複雜面向，無法解釋像印傭這種跨國勞工學習以至運用粵語作為日常溝通語言，是一套怎樣的身份建構過程。

陳允中透過自身學習粵語的小歷史，回應當下以抵抗中國大論述為名，實則重複大論述生產邏輯的「城邦論」或「民族論」。無論「中國性」抑或是「香港性」，都是經過特定的歷史脈絡與社會環境塑造出來。「香港人」在不同的時空有着不同的內涵。

學術論文的格式（如註腳、參考書目），更沒有引用甚麼理論。然而，若將他的文章僅僅視為一篇抒寫個人經歷與反省的雜文，恐怕是被一般學術論文的形式所規限，沒能讀明白這篇文章的問題意識。

陳允中自言作為身處精英階層的大學教師，沒有學習粵語的巨大壓力，直至他介入灣仔「藍屋」保育運動，為跟基層溝通，他才放下身段學習粵語（頁164-65）。這段經歷其實與其他新移民來港後面臨的壓力頗為類似，即被迫學習粵語。然而，其經歷又說明只要新移民願意學習粵語，就可以發現基層之間對粵語口音的包容性其實很高。這一觀察跟人們在大眾媒體看到香港人排拒口音不正的外地人的報導，似乎有點出入。但只要我們理解與陳允中相處的是怎樣的群體，便會發現箇中並無矛盾。首先，包容語言差異者，乃有着共同目標的基層運動參與者；其次，他們都是年紀比較大、家鄉並非在香港、說話腔口仍帶鄉音的老香港人。

陳允中這段經歷的重要性在於，它顯示了香港社會原來對「粵語」有相當的包容性。正如社會學者梁漢柱在〈廣東話與香港社區組織〉一文中指出，陳文的重點在於提醒人們，今天許多香港人視為「標準香港話」的港式廣東話其實是近年的產物，老一輩香港人就算同是操粵語，都有着不同腔口（頁171）。要是我們懷有這種歷史意識，便可反過來質疑「標準廣東話」的正當性基礎，是否一種任意的建構，甚至以「標準廣東話」抹殺人與人之間連結的可能性？陳允中透過一段關於自身學習粵語的小歷

史，回應當下香港流行的、以抵抗中國大論述為名，實則重複大論述生產邏輯的「城邦論」或「民族論」。文章雖然不以學術格式寫作，但處處透露了作者的學術及社會關懷。

陳文的前半部分為作者學習粵語經過的自述，後半部分講述他與老一輩香港人接觸後，理解到鄉音與鄉土之間的關係。他指出，帶着鄉音的香港人都是會「返鄉下」的一代。鄉音，對香港人而言，不只是語言問題，更有着鄉土的意義。鄉音直接聯繫的是跟家鄉無法切斷的關係。相反，現在的香港人跟家鄉的關係愈來愈疏遠，年輕一輩甚至沒有「返鄉下」的需要，所操的粵語亦無鄉音（頁169）。如果將這些觀察用學術語言重寫，就是從老一輩香港人的「鄉音」可見，他們有着難以捨割的「中國性」；相對而言，新一代口頭上的「標準廣東話」，顯示了一種「香港性」已然誕生。這篇文章的啟發性在於，無論「中國性」抑或是「香港性」，都不是自然而然，而是經過特定的歷史脈絡與社會環境塑造出來。「香港人」在不同的時空有着不同的內涵，「城邦論」或「民族論」卻從語言/粵語（以及由此衍生和發展的「粵語文化」）的「同一性」，推論「香港人」身份認同乃具一定連續性，顯然是（故意）誤讀歷史。

陳文以呼籲香港人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本土意識作結（頁170），這顯然吃力不討好。事實上，近年香港各種以製造差異構成的本土意識，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積累而來的經驗和情緒反映，並不是單靠呼籲人們認識歷史、借鑒過去便可輕易處理，還需要更能應對當下以情感

為主導的文化政治論述。縱觀本書的各篇文章，無疑呈現了「粵語」的「異質」與「多元」，尤其是放眼於香港的內部「他者」——少數族裔——與「粵語」的互動關係，確實是思考香港/本土等議題時不能忽略的。然而，「粵語」關涉的「情感政治」問題^⑩，卻是本書未及言說、尚待言說的「『粵語』的政治」。陳允中言說的自身經歷稍稍觸及這個維度，這亦是本文特意以討論此文作結的原因，但有待討論的問題還有很多。

註釋

①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6).

② 2013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編：《香港民族論》（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2014）。特首梁振英於立法會宣讀其2015年施政報告時，曾點名批評該書的「香港民族論」是不能不警惕的「錯誤主張」。事後，該書更是一紙風行。參見〈《民族論》加印三千本〉，《蘋果日報》，2015年1月15日。

③ 〈指廣東話非法定語言 教局道歉〉，《蘋果日報》，2014年2月3日。

④ 陳雲：《香港城邦論：一國兩制，城邦自治，是香港生死攸關之事》（香港：天窗出版社，2011），頁96。

⑤ Plato, *The Republic of Plato*, trans. Allan Bloo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⑥ 譬如陳雲將粵語跟香港人的經濟生活聯繫：「廣東話是甚麼？Stupid，廣東話就是你的飯碗！廣東話、正體字是華夏文化正宗，是香港文化的尊嚴所在，更是香港人的就業壁壘——大陸人講不好廣東話，就無辦法在

香港同你爭飯碗……」參見陳雲facebook，2013年9月18日，www.facebook.com/wan.chin.75/posts/10151825314607225。「中文保育系列」參見陳雲：《中文解毒：從混帳文字到通順中文》（香港：天窗出版社，2008）；《執正中文：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法》（香港：天窗出版社，2009）；《中文起義：破解文化操縱，捍衛民主語言》（香港：天窗出版社，2010）。

⑦ 陳雲：《香港城邦論II——光復本土》（香港：天窗出版社，2014），頁181-249。

⑧ 柏拉圖認為“Doxa”是一些俗見，為有限經驗所得。這裏借用此詞以形容所謂「意見」是部分人的主觀感受，輕率地將之視為充分論據，以論證自身論點。

⑨ Ackba Abbas,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這裏的“disappearance”應解釋作“dis-appearance”，即由「不見」到「顯現」的過程。

⑩ 1940年代末，香港粵語電影盛行「七日鮮」（即七個工作天便完成一部電影），粗製濫造。一眾左翼電影工作者遂於1949年4月8日在《大公報》發表「清潔運動」宣言，要求電影工作者停止拍製毒害社會的影片。

⑪ 羅永生：《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⑫ 曹曉諾：〈香港人的背後是整個文化體系〉，載《香港民族論》，頁51-61。

⑬ 關於情感與政治的研究，參見Dominique Moisi, *The Geopolitics of Emotion: How Cultures of Fear, Humiliation, and Hope are Reshaping the World* (New York: Doubleday, 2009)。

本書的各篇文章，無疑呈現了「粵語」的「異質」與「多元」，然而，「粵語」關涉的「情感政治」問題，卻是本書未及言說、尚待言說的「『粵語』的政治」。